

从“管控”到“赋能”：符号互动视域下高职辅导员角色转型的逻辑推演与理论建构

李格格

(广东财贸职业学院数字供应链学院,广东清远 511500)

[摘要]在高职教育规模化发展与安全至上的制度导向下,学校管理端“秩序、责任、零风险”的符号系统与学生群体“自由、独立、试错权”的核心诉求形成本质互斥,导致辅导员陷入“学校代理人—学生成长引路人”双重角色的符号冲突与结构性管控困境。为摆脱这一困境,本研究以符号互动理论与协同治理理论为支撑,提出从控制逻辑向共生逻辑的治理理念转型:通过赋予辅导员弹性管理的裁量权、承认学生共治主体地位,重构“学校—辅导员—学生”三方共生的治理生态。这一从被动管控者到主动赋能者的角色转型路径,为化解校园价值断裂、缓解辅导员角色内耗、提升高职教育治理效能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关键词]高职辅导员;管控困境;角色转型;符号互动

[作者简介]李格格(1999—),女,安徽淮南人,广东财贸职业学院数字供应链学院辅导员,教育学硕士,研究方向:职业教育、思想政治教育。

[DOI] <https://doi.org/10.62662/kxwxz0305019>

[中图分类号] G645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jkw1966@163.com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进入规模化发展与质量提升并重的新阶段,高职教育不仅承担着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核心使命,更面临着学生规模扩大、群体结构多元、成长需求复杂带来的管理挑战。在风险社会治理逻辑渗透下,高校安全稳定工作成为学校各项事业发展的生命线,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化设计得以强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二十二条明确指出,包括高职院校在内的所有单位必须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层面进一步细化管理细则,将掌握学生动态、防范安全风险列为辅导员的核心职责,形成了对学生学习生活、时空轨迹、行为表现的全方位管控诉求。这种制度化的绝对安全导向,本质上是学校应对社会问责压力、规避管理风险的理性选择,但也为辅导员履职设定了刚性约束。

在制度化的管控要求下,辅导员的工作重心逐渐向动态掌握学生情况倾斜,打卡签到、位置报备、行踪留痕、夜间巡查等刚性管控手段逐渐成为辅导员日常事务的核心组成。然而,与学校强化管控的诉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数字原住民一代的高职学生,主体意识、权利意识与法治观念显著提升,对

“被规训感”的抵触情绪更为强烈,对“被控制感”的敏感度远超以往。他们既渴望在校园生活中获得尊重与信任,追求个人发展的自由空间,又对过度干预、机械管控的管理方式表现出强烈抵触,甚至通过消极配合、隐性反抗等方式回应辅导员的管控行为。这种全方位掌握学生动态的管理指令与学生追求自主自由的成长需求之间的固有矛盾,直接导致辅导员陷入严格管控则激化师生冲突、放宽要求则面临学校问责的两难境地,师生之间因管控产生的摩擦与矛盾日益凸显,成为影响校园和谐与育人效果的突出问题。

因此,立足高职教育规模化发展的制度语境,直面管控诉求与自主需求的核心矛盾,以理论为工具解析辅导员管控困境的生成机理与角色转型的内在逻辑,成为当前高职教育管理研究中亟待填补的理论空白,也为提升高职学生管理质量、促进辅导员职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视角。

二、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一)核心概念界定

1. 高职辅导员管控困境

高职辅导员管控困境并非单一事件冲突,而是在高职规模化发展与安全优先导向下,制度权力、

学生权利与职业伦理三者交织形成的结构性角色张力状态。其本质是多重价值期待失衡:制度维度强调责任压实与风险规避,学生维度强调自主表达与成长权,职业伦理维度强调价值引领与人文关怀。三者博弈使辅导员陷入“严管则冲突、宽放则问责”的两难循环:服从学校制度、尊重学生权利、坚守职业伦理。这导致两难选择,严格管控易引发师生矛盾,放宽管控则面临制度问责与安全风险。最终,多重矛盾与两难选择表现为辅导员在多方面的系统性困境,影响履职效果与职业发展。

2. 角色转型

本研究的辅导员角色转型,是指在符号互动与协同治理双重逻辑下,辅导员在角色认知、行为范式与价值取向层面发生的系统性重构,核心方向是从事务型管控者向发展型赋能者跃迁。

从具体维度来看,角色认知转型意味着辅导员不再将自身定位为制度权力的被动执行者或学生行为的监督者,而是转变为学生成长的引导者、师生互动的协调者与管理生态的优化者,重新确立安全保障与自主发展并重的角色认知;行为模式转型体现为从单向管控转向双向互动,从机械执行规定转向灵活引导共建,通过沟通协商、权利尊重、能力培养等方式替代单一的打卡报备、行踪监控等管控行为;价值取向转型则是从以风险规避为核心转向以学生成长为核心,将职业价值的实现从零安全事故的制度考核导向,回归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育人本质导向,实现制度要求、学生需求与职业伦理的有机统一。这一转型并非单一维度的行为调整,而是三者相互关联、相互支撑的系统性变革,最终推动辅导员角色从工具性的管控者向发展性的赋能者跃迁。

(二)理论基础

米德(Mead)的符号互动理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 Theory)指出,社会现实是通过符号互动建构的,同一行为在不同主体的意义框架中会呈现完全不同的解释。管控行为在学校话语体系中被赋予“安全责任”的正当性符号,而在学生认知中则被解读为“自由限制”的控制符号。辅导员作为意义中介,同时承载两套互斥符号,由此产生角色冲突。这为拆解“同一管控行为引发不同认知”的矛盾根源提供了关键视角,助力深入挖掘意义分歧的生成逻辑。

协同治理理论强调多元主体基于共同目标形

成权责对等、互动协商、责任共担的治理共同体。高职治理中,学校、辅导员、学生并非控制与被控制关系,而是相互依存、价值共生的有机整体。

此外,米德(Mead)的自我通过社会互动建构的理论,为解析辅导员角色的形成与转型提供了关键视角。辅导员的管控者身份,是由学校政策考核、同事互动经验与学生反应等多维度互动共同建构的结果。而角色转型的逻辑同样源于互动重构,通过重塑“命令—服从”为“协商—共建”的互动关系,可推动辅导员从被动管控者向主动赋能者的角色转变,为理论模型建构提供坚实支撑。

三、张力与冲突:高职辅导员管控困境的逻辑解构

(一)场域错位:管理权力与学生主体的价值断裂

高职院校是承担人才培养使命的教育场域与具备规范化管理属性的组织空间,内部管理权力与学生主体存在价值博弈,根源是双方符号认知系统互斥,导致价值断裂。

从管理端看,其核心符号体系由“秩序、责任、零风险”锚定。学校作为公共教育服务机构,维护校园稳定有序是首要目标。“秩序”是管理基础,通过规章制度确保教学等有序推进;“责任”明确履职边界,涵盖学生多方面;“零风险”是责任延伸,通过多种方式规避隐患。该符号系统为管理行为提供合法性。从学生端看,高职学生群体核心符号是“自由、独立、试错权”。青年学生向往“自由”,涵盖行为和思想层面;“独立”是主体意识觉醒标志,学生形成独立判断等能力;“试错权”是成长核心诉求,是个人成长和创新的的重要途径。此符号系统是学生追求自我价值的驱动力。

然而,学校端符号体系以秩序维护、责任闭环、风险清零为核心价值锚点;学生端则以自主选择、独立人格、试错权利为核心诉求。二者在底层逻辑上存在互斥:秩序约束挤压自主空间,责任干预消解独立诉求,零风险逻辑否定成长容错权。辅导员身处场域交界,成为价值冲突的直接承受者。

辅导员一方面承担校园秩序、防范管理风险职责,成为管理端符号系统代言人;另一方面需与学生深度沟通,构成连接管理与学生的桥梁。但优先践行学校管理逻辑时,其行为与学生诉求冲突。在学生眼中,辅导员不再是成长导师,而是管理权力执行者,管理行为合法性丧失,学生抵触,抵触延伸

至学校管理体系,引发管理权力与学生主体的主体性冲突,本质是场域错位下管理端与学生端价值断裂的集中体现。

(二)角色内耗:多重身份的符号冲突

辅导员并非单一的身份载体,而是同时被赋予“学校代理人”“学生成长引路人”双重角色,每重角色都对应着一套独立的行为符号与价值诉求,而缺乏统一的意义符号支撑,最终导致辅导员陷入左右为难的角色内耗,这本质上是一种无法通过个体调节化解的结构性逻辑困境。

作为连接高职院校管理端与学生群体的关键纽带,辅导员的行为逻辑被两组截然不同的核心符号所定义,这两组符号分别对应其“学校管理执行者”与“学生成长引路人”的双重角色,形成了鲜明的导向张力。

从履行学校管理职责的角色定位来看,辅导员的核心行为符号集中体现为“合规、上报、防控”三大关键词。这一角色赋予的核心要求,是让辅导员严格嵌入学校的管理体系框架,将落实管理规范、维护校园秩序视为首要履职目标。其中,“合规”是开展所有工作的基本准则,意味着辅导员的一切行为都必须限定在规章制度的允许范围内,坚决不能偏离管理预设的轨道。例如在学生请假流程的审核、校园活动的审批备案、日常行为规范的执行等具体工作中,都需严格遵循既定标准,确保管理行为的规范性与严肃性;“上报”则是管理责任传导链条中的关键环节,辅导员需要时刻关注学生群体中的异常动态,无论是学业上的严重滑坡、人际交往中的冲突矛盾,还是心理状态的异常波动、存在安全隐患的行为倾向,都需及时、准确地向学校管理层反馈,确保管理体系能够快速响应、及时介入,这正是学校“零风险”管理逻辑在辅导员个体角色上的直接落地与具体体现。“防控”的核心指向则是对学生行为的前置规范与过程约束,辅导员需要通过日常监督提醒、针对性引导教育等方式,提前规避学生可能出现的违反校规校纪的行为,从源头遏制无序因素的产生,最终保障校园整体系统的稳定运行。不难看出,这套“合规—上报—防控”的行为符号系统,本质上是学校管理端“秩序—责任—零风险”核心符号的延伸与细化,其核心导向在于提升管理效率、规避潜在风险,要求辅导员以管理目标的达成为首要考量开展各项工作。

而当切换到学生成长引路人的角色定位时,辅

导员的核心行为符号则转变为“尊重、关怀、自主”的价值导向。这一角色聚焦于学生的个体成长需求,凸显了教育工作的人文关怀本质,与管理角色的刚性导向形成鲜明反差。“尊重”要求辅导员充分认可学生的主体地位,摒弃单一化的管理思维,以包容的态度接纳学生的多元思想观念与个性化表达,不能仅凭管理者的权威地位压制学生的独立诉求与不同意见,而是要构建平等对话的沟通氛围;“关怀”意味着辅导员需要真正走进学生的生活与内心,深入了解他们在学业推进中遇到的困惑难题、日常生活中面临的实际困境、成长过程中承受的心理压力,通过情感上的倾听慰藉、实际问题的协调解决,成为学生愿意信任、主动倾诉的成长伙伴;“自主”则指向对学生主体意识与独立能力的培育,辅导员应积极鼓励学生自主规划学业生涯、自主探索人生方向、自主解决成长中的难题,在合理范围内赋予学生自主选择的空间与适度试错的权利,这一导向与学生群体所秉持的“自由、独立、试错权”核心符号形成了高度契合。这套“尊重—关怀—自主”的行为符号系统,将学生的全面发展与个性成长作为核心导向,强调弱化管理行为中的刚性约束,转而强化教育的引导、赋能功能,让辅导员真正成为学生成长道路上的支持者与引领者。

双重角色对应的符号系统,在实践中形成了无法调和的逻辑冲突。当辅导员以学校桥梁的身份践行“合规、上报、防控”时,必然会与学生成长引路人所需的“尊重、关怀、自主”产生对立,严格的合规要求可能压抑学生的个性表达,频繁的风险上报可能破坏与学生之间的信任关系,过度的控制则会直接剥夺学生的自主空间,导致辅导员在学生眼中丧失“引路人”的合法性。反之,当辅导员倾向于学生成长引路人的角色,给予学生更多尊重与自主时,又可能违背学校桥梁的“合规”要求,面临管理失职的风险,进而影响其工作效能的评价,冲击职业认同。

辅导员对教师身份的认同,侧重于教师身份的自主性、专业性、存在性体验;对干部身份的认同,表现为对科层制的遵守及等级化、行政化、指令式的工作方式,是规范性体验。辅导员的双重角色是建立在缺乏独立职业和专业地位的基础上,缺少实践基础和现实条件,反而因此派生出更多工作职责和考核要求,导致辅导员难以平衡“双重身份”带来的双重职责和双重考核。这必然导致辅导员难以

产生身份认同,增加了辅导员群体的不稳定性。不同符号系统的拉扯让辅导员陷入左右为难的绝境,这种绝境正是场域错位下管理权力与学生主体价值断裂在个体角色上的集中呈现,是一种无法通过个体努力突破的结构性逻辑困境。

四、理念转型:从“控制逻辑”到“共生逻辑”

高校辅导员的角色定位随着时代发展而动态演进。在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加快推进的背景下,辅导员的职业内涵需要紧扣国家教育方针,在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同时,持续拓展职能、推动角色转型。

这种场域价值断裂与辅导员角色内耗,其深层根源在于学校管理长期秉持的控制逻辑,以秩序维护、风险规避为核心,通过刚性规则与权力传导实现对学生群体的单向管理。这种逻辑将管理权力与学生主体置于对立关系中,将辅导员困在多重角色的符号冲突里,最终导致治理效能的异化与教育价值的损耗。要摆脱这一结构性困境,必须实现治理理念的根本转型,即从“控制逻辑”转向以协同治理理论为基础的“共生逻辑”,通过多元主体的共治共赢,重构校园治理的价值基础与实践框架。

在校园治理场域中,学校管理方、辅导员与学生群体并非对立的博弈方,而是构成了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共生关系:学校的教育使命需要通过辅导员的桥梁作用落地,辅导员的职业价值需要在服务学生成长与落实管理要求的平衡中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则需要学校提供包容的成长环境与自主的探索空间。协同治理的核心要义,正是打破管理方主导、学生被动服从的单向控制模式,构建“学校引导—辅导员协调—学生参与”的共治体系,让三方在共同的教育目标下形成合力。

理念转型的首要实践路径,是学校赋予辅导员弹性管理的裁量权,打破“控制逻辑”下的刚性约束框架。此前,辅导员的行政行为被学校系统严格限定,缺乏根据具体情境灵活调整的空间,面对学生的个性化诉求,只能机械执行规章制度;遭遇管理逻辑与教育逻辑的冲突时,只能被迫优先服从管理要求。而“弹性管理”裁量权的赋予,并非对规则的否定,而是在制度框架内给予辅导员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置的空间。例如,在学生请假、活动组织等事务中,允许辅导员结合学生的具体需求与实际情况,在不违背核心管理原则的前提下进行灵活调整。在应对学生的试错行为时,不再以“零风险”为

唯一标准,而是兼顾教育引导与风险防控,给予学生改正的机会。这种弹性裁量权的核心价值,在于让辅导员从“管理符号的被动代言人”转变为“治理过程的主动协调者”,能够在管理要求与学生需求之间寻找平衡点,既落实学校的治理目标,又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从而缓解角色内耗的结构性压力。

理念转型的另一关键维度,是学校真正承认并保障学生的主体地位,将学生从“被管理对象”转变为“共治参与主体”。“控制逻辑”的本质是将学生视为需要被规范、被保护的客体,忽视其独立的价值诉求与参与治理的能力;而“共生逻辑”则强调,学生作为校园场域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其主体地位不仅是教育的目标,更是治理的基础。承认学生主体地位,首先需要在制度设计中纳入学生的参与权。例如,在制定校园规章制度、规划教育教学活动时,通过听证会、问卷调查、学生代表议事等形式,广泛吸纳学生的意见与建议,让规则更贴合学生的成长需求;其次,需要赋予学生自主管理的空间,鼓励学生成立自治组织、参与校园公共事务管理,在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中培育主体意识与责任担当;更重要的是,要尊重学生的试错权与成长权,将学生的探索行为与犯错经历视为成长的必要过程,构建“容错纠错”的治理机制,而非以“零风险”标准进行简单否定。当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真正承认,其“自由、独立、试错权”的核心符号不再与管理逻辑形成绝对对立,而是转化为参与共治的内在动力。管理权力与学生主体之间的价值断裂也将随之弥合。

从“控制逻辑”到“共生逻辑”的理念转型,本质上是校园治理价值基础的重构,即从“秩序优先、控制为本”转向“协同为核、共生为要”。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弹性管理裁量权为辅导员提供了协调矛盾的工具,学生主体地位的承认则为共治提供了根本前提,两者共同构建起“学校—辅导员—学生”三方共生的治理生态。在这种生态中,学校的管理目标不再是单向的秩序维护,而是通过协同实现教育价值与治理效能的统一;辅导员的角色不再是多重符号的冲突载体,而是以协调者、引导者的身份,在学校与学生之间搭建起有效沟通的桥梁;学生的主体诉求不再是与管理逻辑对立的“异质符号”,而是推动治理优化的重要力量。

值得强调的是,这种理念转型并非对管理责任的弱化,而是对治理方式的升级。协同治理并不意

味着放弃规则与底线,而是通过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让规则更具合理性与执行力,让治理更具温度与效能。当校园治理真正实现“共治共生”,管理权力与学生主体的价值冲突将转化为协同进步的动力,辅导员的角色内耗也将在结构性矛盾的化解中得到根本缓解,最终实现校园场域的良好互动与可持续发展。

五、结语

高职辅导员管控困境,本质是安全优先的制度逻辑与学生主体成长逻辑之间的价值断裂在个体层面的集中显现。摆脱这一困境,需要以符号互动理论重构师生意义沟通机制,以协同治理理论重塑多元主体权责关系,推动辅导员角色从管控型事务者向赋能型引领者深度转型。当共生逻辑替代控制逻辑、对话符号替代对立符号,辅导员角色内耗将得到有效缓解,校园治理将走向秩序与活力兼

具、安全与成长统一的良性生态。

参考文献:

- [1]郭丽君,王佳宁.“双高计划”背景下高职专业认证的现实挑战与发展路径[J]. 职业技术教育,2025,46(32):6-11.
- [2]黄存金.新时代加强高校安全稳定工作探析[J]. 思想教育研究,2019(1):100-103.
- [3]刘雨.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提升路径[J]. 职业技术教育,2018,39(32):77-80.
- [4]张晴.应用型院校辅导员角色从实然到应然的路径选择[J]. 教育与职业,2018(6):83-86.
- [5]张庆熊.符号互动论的社会理论:以布鲁默为中心的考察[J]. 社会科学,2024(4):13-23.
- [6]陈勇,朱平.高校辅导员“双重身份”的现实与未来[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10):144-148.

From “Control” to “Empowerment”: Logical Deduction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Role 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Counsel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LI Ge-ge

(School of Digital Supply Chain, Guangdong Finance & Trade Vocational College, Qingyuan Guangdong 511500,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scaled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institution orientation prioritizing safety, the symbolic system of “order, responsibility and zero risk” adopted by school administration is inherently incompatible with students’ core demands for “freedom, independence and the right to trial and error”. This puts counselors in symbolic conflicts between their dual identities as school representatives and mentors for students’ growth, trapping them in structurally restrictive governance dilemmas. To address this predicament, this study draws on symbolic interaction theory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eory, proposing a governance paradigm shift from control logic to symbiosis logic. By granting counselors discretionary power for flexible management and recognizing students as co-governance subjects, a symbiotic governance ecosystem among schools, counselors and students can be reconstructed. This role transformation from passive regulators to active empowerers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bridging campus value division, reducing counselors’ internal role friction and improving the governance efficiency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counselor; governance and control dilemma; role transformation; symbolic interaction